

# 海外移民与近代闽粤 侨乡社会观念的变迁

●郑甫弘 熊蔚霞

在探讨海外移民与侨乡社会的关系时,通常侧重于经济影响的考察,如对华侨投资、侨汇等的研究。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决定因素,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侨乡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反,长期的海外移民和频繁的海外联系却对侨乡地区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近代闽粤侨乡社会思想观念的某些嬗变。

## 一、海外移民传统与海外发展观念

闽粤侨乡大都地处沿海,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便在业农之余向海求利,或打渔或航海经商,渔海商航是沿海人民传统的一种谋生方式。唐宋以来,作为东方贸易大港的广州、泉州便流寓有许多海商大贾,使闽粤侨乡人很早就有较强的海外发展意识,出海谋生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农村的破产,手工业的凋零使得城乡到处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使他们无法获得谋生的职业,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匪患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广大农民不得不纷纷逃离家园,谋生他乡。内地农民有的迁往地广人稀处另辟天地,有的到城市受雇于他人,有的沦为兵匪或乞丐。闽粤侨乡人民则大批流徙外洋。广东沿海各县,因无工可做,“相率卖身当猪仔,到南洋去当苦工者每年约以千百计”。开平县人口中约10%离村后到海外谋求生路。潮安县第六区银湖村的壮丁2000左右,出洋的竟在800以上,约占40%,该县第七区华美村的壮丁,有70%是出洋或出过洋的,全县壮丁有20%在南洋。<sup>①</sup> 据1935年的统计,晋江县在外华侨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0%。<sup>②</sup>

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使闽粤人民对出国谋生充满幻想,“竟将出洋认为是一种发财的最终捷径,以为凡是有机到南洋去的,总可大捞一番,满载而归,因此能够攀到关系的人,固然趋之若狂,即毫无门径的人,也日夜做梦想出洋。”<sup>③</sup> 于是有一些人在厦门、汕头、香港一带遍设所谓的“职业介绍所”或“猪仔馆”,替外国人招募工人。成千上万做着南洋美梦的穷苦力,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许多人老死在矿场里,被矿场主榨干了血泪。出国华侨绝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向海外谋生往往使他们具有了冒险和吃苦精神。

不能忽略回国华侨和侨眷对侨乡人的影响。多数华侨的发财梦想破灭了,但努力奋斗终成致富者也不少。这些成功的华侨有的荣归故里,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如厦门、汕头、广州、江门、海口等侨乡城市盖起了新式的洋楼,在厦门鼓浪屿,“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在厦门和远离市中心的一些西式洋楼,也同样是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所盖的。”<sup>④</sup> 富裕华侨回到家乡,生活奢侈,大讲排场,他们“兴土

木,筑大屋,神工鬼工久雕琢,大妆奁,大聘金,一嫁一娶费沉吟,乡人相惊羨。”<sup>⑧</sup>不少侨眷也由于有海外亲人的接济,生活富裕而舒适,却很少从事劳动生产。大量华侨回国建房和汇款回国是近代侨乡才有的现象,如果说在此之前侨乡人向海外发展观念还很模糊的话,那么由于对成功者财富的羡慕,近代人民出洋观念已变得清晰而强烈,侨乡人对南洋似乎像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所说的中国是满地黄金白玉一样,所以一般的青壮年都懂得住在家乡是没有出息的而具有“过番”心理。在福建省福清侨乡,男子一到身高体壮时,就拿着雨伞包袱和他的叔叔伯伯们到南洋去了<sup>⑨</sup>;在美洲华侨的故乡四邑,“大部分的人也都希望到美国掘金去”<sup>⑩</sup>。所有这些造成闽粤侨乡人民出国绵绵不断,甚至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东南亚一带亦遭受殖民者的劫掠,但总的说来,谋生空间比国内宽阔得多,经济成功回报率亦较高,闽粤人民利用地理之便纷纷出国谋生,冀望通过累年积月的辛勤劳作,使自己成为富裕的华侨,来改善自己的人生道路。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希求成为闽粤侨乡人民向海外发展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 二、重商意识与重利观念

在闽粤侨乡,“无论老幼,如提到生计问题,视线的焦点,立刻集中在商业上头”,他们认为“如要赚钱,如要赚大钱,就应做生意去,往南洋做买卖去”<sup>⑪</sup>。做生意成为侨乡人一般的信心和观念。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是希望子女学会打算盘,能记帐写信,以便将来有能力在商店里任职,做生意,或能接替自己的事业发展生意。许多侨眷也注意在平时对子女进行商业训练,希望他们长大后经商。侨乡土地占有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侨乡人民对土地投资的热情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并不相称,人们大多愿意留着资金从事商业经营。侨乡富户虽多,但土地占有却极为分散。不少侨眷家庭并不占有土地,他们认为与其向土地投资,不如留着钱从事商业合算。

重商观念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首先,大量的侨汇使得一些侨眷在生活之余仍有经商资金,侨汇亦使侨乡购买力旺盛,从商变得更为有利可图;其次,闽粤许多侨乡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与其向贫瘠的土地投资,不如拿钱做买卖去;再次,华侨也大多从事商业,他们对家乡人的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1931年统计,缅甸华侨中商人占41%,泰国华侨在商业界谋生约占70%,马来亚华侨也多从事商业买卖。在印尼,分布于商界的华侨占36.6%,福建华侨半数以上都从事商业活动。经商的华侨往往以自己的经验来开导家人,在他们看来,种田赚死钱,经商赚活钱。此外,回国投资的华侨也往往将资金投放到商业上。侨乡商业气氛浓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侨乡商业气氛的浓厚使侨乡人对于利的观念看得比较重。在广东,“工商百姓莫不为利,有利可图,虽受尽千辛万苦甚至牺牲生命亦所不顾。”<sup>⑫</sup>许多华侨在出国前的生活亦过得去,但为求厚利往往抛妻别子,漂泊异域,如福建晋江灵水乡,田地肥沃,粮食够用,“为求得更好的利益,亲引亲而出洋,”造成该乡“几乎家家出洋客”<sup>⑬</sup>。利是每一个人无可非议的嗜好,非求不可,也正是人们的重利观念使得侨乡人具有了敢于冒险,奋发向上的品格。但侨乡人的重利观念却也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后果。在广东台山,“问某地谁最有势力,最有办法,最可钦佩,先估量一下美金谁最多。”<sup>⑭</sup>在他们的头脑中,新闻记者还不如家中供使唤的女婢,忠实文人寒士不是他们的眼中物。金钱成为他们衡量一个人能力和地位的唯一标准。在台山,不懂台山话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在其心目中,唯有外国人和富裕的华侨才可敬佩。<sup>⑮</sup>重利观念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侨乡子弟对读书的轻视。他们“几乎个个迷洋迷商”,“读书不是出息的路的观念普遍灌输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认为出洋或经商才是出路,于是敷衍学业。<sup>⑯</sup>事实上,侨乡的教育只是变成了经商的基本训练,如写信、记帐、史地常识等。侨眷妇女也“多不识字,大都没有受过良好

的教育。”<sup>98</sup> 虽然侨乡由于华侨的努力,学校办了不少,但对读书兴趣的淡薄使侨乡教育大为逊色。

### 三、崇尚外来文明与崇洋崇侨观念

华侨对国内投资,除上海以外,大都集中于厦门、广州、汕头、海口等侨乡重要城市。华侨投资构成了这些地区近代化投资的最主要的部分。在广州,华侨投资占该城市近代化投资的40%,而在福建厦门更高达67%。在许多投资中,华侨都起着开拓者的作用。厦门、汕头、江门、台山等地的制冰厂、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等都是华侨最先创办的。外来物质文明的传入不仅较大地改变了侨乡人民传统的物质生活结构,而且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近代,南海、新会、中山等重点侨乡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并非偶然,他们在整个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变革运动中发挥了先驱和核心的作用。它表明,由于外来文明的冲击,侨乡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从外表看,侨乡也处处烙上了外来文明的印记。台山的乡村“远远望去煞像香港的外貌,高高的巍楼和三四层的洋房,雄峙山顶”,被人们誉为“小檀香山”、“小金山”。<sup>99</sup> 四邑由于有许多“像美国一样的房子、公路、铁道、市镇”而使得人们有跑到外国的土地上去之感。<sup>100</sup> 台山北部的公益埠“亦富欧美风味”。<sup>101</sup> 广东南海县的九江“建筑有南洋风味……随处可以见到棕榈树和散尾葵,青塘畔的房屋都带着异地风光……因而拥有‘南中国的瑞士’的美誉。”<sup>102</sup> 海南岛的文昌侨乡“富室房屋也仿作欧风”。<sup>103</sup> 而在汕头、厦门、泉州、江门等侨乡城市,西方和南洋风格的房屋更是比比皆是,表现出侨乡人民对外来文明的首肯与欣赏。

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表现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在侨乡,人们对外国货的消费不断增多,地道的中国货变得不受青睐。20世纪初的厦门社交场上,外国酒就已大量地取代了中国酒。<sup>104</sup> 对外国货的消费程度成为人们衡量财富与权势高低的标志。咖啡的饮用也日益普遍。30年代,用餐时饮咖啡和以咖啡代茶款客仅限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40年代饮用咖啡有的地方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在海口,咖啡店之多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里,都挤满了喝咖啡的人,他们举杯细细寻味,悠闲自若。”<sup>105</sup> 不仅城市如此,一些乡村喝咖啡的习惯也很普遍,如海南侨乡“虽乡村小户亦必以咖啡红茶以待宾客。”<sup>106</sup> 可以看出外来生活方式对侨乡社会的影响。服饰方面,侨乡人也竞相追求洋化,30年代的潮汕、厦门等地“著西服的时风,在一部分的青年是极盛的,特别是学生或与外洋有过接触的人。”<sup>107</sup> 40年代有的侨乡穿着“西装革履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类多效法欧美。”<sup>108</sup> 在广东开平的赤坎集市上,看到的往往是梳着光亮头发穿着笔直西装的时代青年。侨乡女子在洋化气氛感召下对追求时髦表现得较为热烈,赤坎的许多农村女子往往用卷曲的头发,漂亮的美国花绸衣服来装饰自己。<sup>109</sup> 晋江的女子,喜欢穿着花花绿绿,成群结队到城里去烫发,一间理发店一日烫发十人,而乡下姑娘和侨属女子却占了十之七八。<sup>110</sup> 地道的中山石岐姑娘,往往涂满口红胭脂,为烫发挥霍巨资而毫不吝惜,巴黎香水,各种名牌口红以及尼龙丝袜也是她们日常的修饰物。<sup>111</sup>

饮食和服饰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出侨乡人因外来的接济而生活富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珍惜现世享受的心态,这事实上是侨乡人的普遍心态。从战前到战后,无论城市或者乡村,迎神赛会,娶嫁葬丧等无不大肆铺张,竞争奢侈排场。大量的侨汇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却被追求眼前的享受所挥霍掉了。结果侨乡虽然有大量侨汇,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仅表现为外运内销活跃,而呈现出商业的畸型行为和虚假繁荣。

人们在对外来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欣赏与模仿中还培养出一些盲目的崇洋崇侨心理。厦门“一般人的心理，都不以托庇外籍为羞，上至社会闻人，下至烟囊龟鹤，莫不以得作某国籍民为荣”，一些中国人的高楼大厦外，“大书某某国籍民，好是乡村中悬挂扁额般。”<sup>9</sup>此外，他们还以拥有外国物品而自傲，常以在外华侨寄回的洋物向人夸耀，表现出“洋人的东西总是好的”心理。在近代中国，受西方文明冲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非独侨乡如此。但在闽粤沿海侨乡其崇洋崇侨与西化程度较之非侨乡更深，表现也更明显。

#### 四、畸型婚俗与婚姻观念

闽粤侨乡与海外的接触对人们的婚姻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工厂企业的兴办使一些妇女也能获得工作的机会；某些谋生门径使她们在经济上可以自立而不必通过婚姻来获得生活的依靠；而对传统封建婚姻专制和夫权压迫的不满更使一些女子抱定独身主义而终身不嫁。在广东顺德、中山、南海和番禺南部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侨乡地区，存在着女子“自梳”和“不落家”的风俗。“自梳”指的是未婚女子自行易辫而髻，以示决心不嫁，终身独老。“不落家”指举过婚礼后的女子长住娘家，避免与丈夫同居。她们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生活既不依靠娘家亦不依靠夫家。有些独身女子还远涉重洋，到新加坡、马来亚、安南等地帮佣谋生，人数不少。由于在外佣工时间长，有的还“深谙英法等国语言”<sup>10</sup>，成为侨乡妇女中的佼佼者。

回国华侨，有钱的固然财大气粗，生活奢侈，没钱的也尽自己几十年辛苦积蓄乘回乡之机好好排场风光一下。在侨乡人看来“金山客没一千也有八百”，“吕宋客没一千也有八百”。人们一听见“华侨”二字，就联想到“有钱”，对华侨满含着羡慕，认为所有出洋的华侨都是有钱人。在广东四邑的人们对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尤其羡慕，总以为是个个发了财回来。对侨眷，人们同样羡慕。不管人们对华侨和侨眷们生活的看法如何夸张，华侨及其在国内的家庭除了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其生活事实上一般比非侨眷家庭优越得多。出现了女子争嫁华侨的现象。在二三十年代的侨乡，“一个闽粤籍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家乡去，不一定有人向你说亲……而一个从金山回来的华侨不管你的年龄是二十、或三十、以至于四十，带着幼女庚贴来说亲的媒娘，会把你家里的阶石踏低了几尺。”<sup>11</sup>这些描述虽属夸张，但却不失真实。厦门附近侨村一位15岁的女子被父亲强迫许配给一位40余岁的有钱华侨。<sup>12</sup>尽管太平洋战争期间，侨汇中断，在忍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中，多少侨眷妇女诅咒着“以后女儿再也不让她嫁给侨客了”，但战后的侨乡女子受金钱的诱惑，几乎是“非番客不嫁”<sup>13</sup>，大有“万般皆下品，惟有番客高”之势。战后的四邑女子争嫁“金山客”，“女公务员及中大学校女毕业生，近与金山华侨结婚者，据计已有不少。”<sup>14</sup>

据当时报载，晋江石狮近郊东圆村有一年青而又富裕的侨妇，战时丧夫，战后欲招人入赘，要求年龄在25至30岁，身体强健，略具知识等；有意者须“亲往面洽然后决定”，引得许多侨乡男子纷纷前往面试。<sup>15</sup>在旧的婚俗中，只有男子对女子“看相”和“睇相”，却无女子选择男子的主动权。而东圆村侨妇的招人入赘在当时未尝不是一件大事。而许多男子前往应试又印证了侨乡中“白银买人心”的俗谚了。对金钱的崇拜和对华侨的迷恋在侨乡却也闹出了许多婚姻的悲剧。泉州一女子宝珠，因其母对侨眷生活羡慕，希望为女儿择得一如意金龟快婿，却被骗与一伪称“大番客”的男子李长源订婚同居。后李长源诈得宝珠巨金又逃之夭夭，母女俩始知受骗上当，后悔不迭。<sup>16</sup>

侨乡一些奇怪的婚俗。华侨远在异地，一时难以归国娶亲，其父母便代为包办婚姻。父母凭着寄回的相片央求媒人找寻对象，择吉成亲，一些侨乡女子仅凭照片就答允了婚事。举行婚

礼时,新郎又在外,则将新郎的长衫马褂,毡帽和鞋袜(西化一点的用西装、恤衫、领带和皮鞋)盛于一个大型红色喜盒,另将一只雄鸡代作新郎而与新娘大行其“新婚大典”,花烛之夜雄鸡还要逗留洞房,新郎的照片则挂在梳妆台旁边供新娘日夕相睹,作为精神伴侣。在广东的四邑,潮汕等侨乡都有此俗。<sup>⑨</sup> 福建闽南地区也有此俗,只不过不用雄鸡,而是“托姊妹对拜,取成双之意”,称之为填房婚。<sup>⑩</sup> 显然,这些奇怪的婚俗只有在侨乡的特殊环境下才可能出现的。

综上考察,近代闽粤沿海侨乡地区在社会思想观念的若干方面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海外移民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回馈是引起人们观念变化的基本动因;同时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对自身和周围环境不断适应和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意识的变化。它既有积极的好的一面,又有消极的坏的一面,有时甚至带有偏面性和盲目性。所以我们在强调海外移民对家乡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消极方面的影响。

### 注释:

-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40页;第三辑,第890页。
- ②《福建省统计年鉴》(1937年),第97—98页。
- ③甘笄:《南海缤纷录》,见南洋所藏剪报资料00363号。
- ④②①《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59,356页,1990年版。
- ⑤吴增:《泉俗刺激篇》,“洋客”条。
- ⑥吴昭汉:《侨眷在福清》,载《海外归侨》创刊号,第16页,1943年5月版。
- ⑦《华侨知识》,1947年2月号,第23页。
- ⑧②①①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76—77,199,101,136,150页。
- ⑨李景新:《广东人的出洋》,载《闽侨月刊》,1939年正月刊,第60页。
- ⑩《安海乡土史话》,第1辑,第15页。
- ⑪《侨乡民间景象》,载《民声报》,1946年6月27日。
- ⑫⑬梦阳:《小金山——台城》,载《公理报》,1947年11月20日。
- ⑭《民国日报》,1948年6月19日。
- ⑮《敬向侨属进一言》,载《福建日报》,1946年10月17日。
- ⑯⑰陈刚父:《闽粤人眼中所见的华侨》,载《南洋情报》,第二卷,第6期。
- ⑱雷公权:《公益埠在新生中》,载《星岛日报》,1948年4月5日。
- ⑲春阳:《九江——南中国的瑞士》,载《华侨知识》,1947年3月号,第25页。
- ⑳许崇灏:《琼崖志略》,1947年版,第56页。
- ㉑陈梅青:《海口风情》,载《公理报》,1948年3月19日。
- ㉒田曙风:《海南岛游记》,1936年版。
- ㉓田曙风:《海口风情》,载《公理报》,1948年3月19日。
- ㉔冰姑:《华侨的家乡赤坎》,载《公理报》,1948年7月12日。
- ㉕《厦门大报》,1946年7月2日。
- ㉖惠文:《石岐素描》,载《公理报》,1948年6月1日。
- ㉗茅乐楠:《新兴的厦门》,1934年版,第83—84页。
- ㉘⑲《广东风情录》,第23—25,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㉙苏非:《石狮侨乡面面观》,载《厦门民报》,1948年11月10日。
- ㉚《新加坡》《南侨日报》,1947年4月10日。
- ㉛⑳《华侨商报》,1948年8月29日。
- ㉜国庆:《福建的婚俗》,载《虚风》月刊,第5,6期,第10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